

美国军事干预主义： 一个社会进化的诠释*

唐世平 [新加坡]龙世瑞

【内容提要】 作者通过社会进化范式,将物质与观念因素有机地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对二战后的美国军事干预主义进行深度解读。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美国精英和民众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支持)是不能单纯用观念或心理因素来解释的。地理环境和被技术优势放大的综合国力是理解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物质变量。这两个因素强有力地保护了美国精英和民众免受战争蹂躏之苦。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民众和精英对战争的前景排斥较少,因此,美国在二战后要比其他大国更积极地进行海外军事干预。

【关键词】 社会进化范式;美国军事干涉主义;物质力量;观念

【作者简介】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 邮编:200433);龙世瑞(Joey S. R. Long)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教授。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11)09 - 0084 - 28

* 本文的英文版已经在《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在线出版。中文版的出版获得 Sage 出版公司的许可,本文相比英文版有删节。感谢郎平的翻译。英文版参见 Shiping Tang and Joey S. R. Long, "America's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May 11, 2011, <http://ejt.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1/04/29/1354066110396763.abstract>.

— 概述

作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无论好坏都将对国际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后应对安全挑战的进攻性方式使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对美国国际行为的解释都基于“观念主义(ideationalism)”。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者的大多数分析家们认为,美国进攻性的海外干预体现出观念以及这些观念持有者的影响力;而那些关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学者则一致断言:美国的“观念市场”出现了重大的问题。一些学者指责乔治·W. 布什及其政府夸大恐怖主义的威胁,故意操纵舆论,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界定“九一一事件的意义”,在“观念的市场”上将对手消于无形。^①

还有专家试图从深层次上解析布什主义和美国干预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观念以及观念持有者的决定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孟捷慕(James Mann)和安德鲁·弗里波特(Andrew Flibbert)指出,布什政府中的“瓦肯人(Vulcans)”只要进入白宫就会将他们的观念转变成政策。他们纠结于越南战争的失败,决心再造美国的荣耀,为此,他们仰仗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在海外推进“高尚的”)美国理想。九一一事件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改写中东政治地图为己所用的绝佳机会。^②阿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和乔纳森·蒙顿(Jonathan Monten)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受到清教的推动,在制定和维持美国进攻性的海外行动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③简·克拉默(Jane Cramer)发现,“军事化的爱国主义”以及冷战时期的两个规范——支持强有力的国家安全政策和在军事问题上对政府的顺从——都使得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在观念市场中处于弱勢

^① Chaim Kaufmann, “Threat Infl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The Selling of Iraq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1, 2004, pp. 5–48; Andrew Flibbert, “The Road to Baghdad: Ideas and Intellectuals in Explanations of the Iraq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2, 2006, pp. 310–352; Ronald Krebs and Jennifer Lobasz, “Fixing the Meaning of 9/11: Coercion, Hegemony, and the Road to Iraq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16, No. 3, 2007, pp. 409–451.

^② James Mann,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004; Andrew Flibbert, “The Road to Baghdad: Ideas and Intellectuals in Explanations of the Iraq War,” pp. 310–352.

^③ Anatol Lieven, *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nathan Monten, “The Roots of the Bush Doctrine: Power,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S.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4, 2005, pp. 112–156.

地位。^①

即使是传统上不重视观念在塑造国家行为中作用的现实主义者,如今也开始用观念因素来解释布什主义和伊拉克战争。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运用心理学和观念来解释小布什的行为:恐惧、反应过度以及总统个人的理念——这个国家和政府被赋予了打击邪恶、为他人谋福利的使命——决定了其外交政策的走向。^② 甚至此前曾经强烈反对过分强调观念在解释国家行为中作用的迈克尔·德施(Michael C. Desch),如今也开始批判“自由的反自由主义”将美国拖入了海外军事冒险的困境。^③

这些观念层面的解释无疑加深了我们对美国在伊拉克干预、布什主义的根源以及美国军事干预主义的一般性认识。不过,对观念因素的过分强调也是不全面的,难以令人满意的,甚至会引起误解。虽然领导人的个性和观念因素对理解美国的行为的确很重要,但是将布什政府的干预归因于某一种或两种“主义”,即使是相当合理的,也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

尽管我们不能直接将物质力量与行为相联系,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只是断言某些观念导致了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局限于回答布什政府是利用和倡导了什么样的观念从而在观念的市场赢得竞争。我们还必须要问一问,是哪些物质因素促成了这些观念和布什政府在观念市场上的胜利。如何将物质与观念这两种力量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框架才是真正的挑战。

此前,唐世平提出了从社会进化论的视角来认识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社会进化范式(简称SEP)”。^④ 该范式借助“人工”的变异-选择-遗传的社会进化机制,试图将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这里,我们运用社

^① Jane Cramer, “Militarized Patriotism: Why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Failed after 9/11,” *Security Studies*, Vol. 16, No. 3, 2007, pp. 489–524.

^② Robert Jervis, “The Remaking of a Unipolar Worl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3, 2006, pp. 7–8.

^③ Michael C. Desch, “Liberal Illiberalism: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Overreaction in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2008, pp. 7–43; Millner Benjamin,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1, 2010, pp. 26–65.

^④ Tang Shiping,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in Robert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41–162; Tang Shipi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1, 2010, pp. 31–55; Tang Shipi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published book manuscript; Tang Shipi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0, online first, <http://pos.sagepub.com/cgi/rapidpdf/0048393109355294v1>.

会进化范式来更好地解释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并进一步支持我们的论断:社会进化范式是社会科学中一个拥有强大解释力的范式。

我们认为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即美国精英和公众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支持——并非单纯是观念力量使然;地理以及因超强科技实力而被放大的综合实力这两个物质层面的变量是理解美国海外军事干预不可或缺的因素。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远超他国的强大实力,大多数美国精英和公众都未能亲见战争带来的可怕灾难。因此,与其他大国相比,总体上看,美国公民较少排斥将武力作为一种治国方略。相类似,美国的政界(如政府、议会以及外交决策圈)、商界和文化界(如教会、当地社会名流和高校)的精英们对使用武力解决海外冲突的做法比其他大国的精英更富有热情。^①结果是,支持海外军事干预的想法更易于在观念的市场上获胜,二战以来美国始终比其他大国对海外军事干预的热情高。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有三点需要说明:

首先,我们只关注在何种水平上精英和公众的支持才能促使政府发动针对另一国的军事行动。这个数据点的选择至关重要。

其次,我们并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国内存在着反对使用武力的强大呼声。同样,我们此举也并非是对所有美国军事干预行动的一概谴责,而是试图揭示美国干预主义存在的根源。

最后,我们之所以选择美、英、法三个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精英和公众舆论的数据易于获取。这三个国家都是没有放弃使用武力主权的“西方民主”国家,它们还构成了对我们所关注的两个变量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美国(在较低程度上包括英国和法国)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对外军事干预基本都远离其本土,而中国、印度(在较低程度上包括苏联或俄罗斯)的军事干预大都发生在靠近其边界的地区。

本文剩余的部分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二部分介绍了社会进化范式如何理解国家的行为;第三部分提出我们的研究问题并解释案例的选择;第四部分的定性分析表明,地理和权力两个因素对美国决策者和公众对战争看法存在影响,对战争的记忆也影响了精英和公众对战争行动支持与否的态度;第五部分是定量分析;第六部分指出我们的讨论对于理解国家行为的理论意义;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① 本文中“精英”的界定来自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对该委员会的调查及其不足,参见 Lawrence R. Jacobs and Benjamin I. Page, “Who Influences U. S.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1, 2005, pp. 107 - 123;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2001),” Reprinted in *Mak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237 - 268。

二 解读国家行为的社会进化范式

对将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整合于一个有机框架这一问题, 本文的社会进化分析框架主要基于如下核心前提假说: 第一, 人类社会是由物质和观念力量构成的, 两者的相互作用塑造了我们的世界, 尽管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优先于观念力量。^① 任何社会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将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同时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中去, 必须将物质和观念两种力量有机地整合起来。第二, 观念并非产生于真空, 而是基于某种物质基础和某些物质条件。观念出现以及随后在观念市场上或赢或输都受到物质和观念两种力量的影响。第三, 观念可以反过来通过人类行为改变自然环境和观念环境。尽管人类引致的变化不能完全再造自然世界, 但是自然环境的人为变化却能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物进化。^②

对国家行为的解释, 社会进化范式认为, 只有将物质和观念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 其关键是将物质力量纳入分析框架, 来解释为什么某些观念在观念市场上会胜出或被淹没。

社会进化范式对国家行为的认识是基于社会进化的核心机制“人工”变异-选择-遗传。在变异阶段, 人类观念的产生是基于他们对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解读, 基于物质和观念力量之间互动的基础和限制条件。在选择阶段, 不同的观念通过“人工选择”而被选择(正选择)或被抛弃(负选择), 这个过程涉及自然环境和人类智慧。在这个阶段, 人类在观念市场上选择观念, 选择的环境受到物质和观念两种力量的影响。在遗传阶段, 在观念市场上胜出的观念会被传递到下一代(垂直遗传)或者扩散到其他人类或族群(水平遗传)。在古代, 获胜观念的扩散是通过符号、仪式或口述的形式完成的; 在现代, 在保留(并强化)上述古代方式的基础上, 胜出观念的扩散方式也更高级了, 包括媒体、教育以及流行文化(文学、电影和电视等)。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观念构成人类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还成为传奇、惯例、规范或简单地说“文化”。社会进化范式认为, 只有被选择的观念才能够最终成为政策和实际的行为。^③

① John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p. 55-56.

② Tang Shipi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0, on-line first, <http://pos.sagepub.com/cgi/rapidpdf/0048393109355294v1>.

③ Tang Shiping,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pp. 141-162.

因此,社会进化范式整合了两个过程来解释国家行为:经选择的消极学习和通过积极学习的社会化,即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一方面,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①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在其理论框架中非常重视经选择的消极学习,认为物质环境会迫使国家学习适应,否则就会付出极高的成本;^②另一方面,建构主义则强调积极的学习或者观念的扩散(即水平遗传)是塑造国家行为的一种社会化力量。^③社会进化范式认为,消极学习和积极学习共同作用塑造了国家行为。在该范式下,消极学习对应的是变异-选择-遗传的核心进化机制中的选择,社会化(通过积极学习)对应的则是遗传(即观念的扩散)。“人工”变异-选择-遗传的整个过程都受到物质和观念环境因素的主导。这里,我们最关注的是选择的更持久的一面(消极学习)以及观念的遗传(即扩散),尽管我们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涉及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负面经验之后(如越南战争)的短期负面学习(具体内容详见后文)。

三 问题与案例

我们的总体假说很直截了当:由于地理位置因素以及被技术优势放大的综合实力,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和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免于遭受战争的毁灭和恐怖。其结果是美国人常常会大大低估战争的真实成本,而缺乏“负面的战争历史记忆”。由于缺少这种负面记忆的“刹车”力量,美国人要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容易支持政府的海外军事干预。因此,总体的因果联系是:地理和实力/技术决定了战争记忆,而战争记忆进而塑造了公众对军事干预的态度。^④

具体而言,大西洋、北极以及太平洋像护城河一样成为美国的缓冲区,使美国免于直接经历国家间暴力所带来的死亡和毁灭。同时,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常常令其对手自惭形秽,因而美国在其历史上经历的绝大多数冲突中都能够处于上风。技术水平是力量的放大器,由于在技术和军事上领先于其真正的和潜在的敌人,美国因此得以将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p. 118;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30-331.

^② 选择本质上是一个消极的过程,即消除一些突变的过程。华尔兹的社会化与选择过程是一样的。华尔兹强调国家会仿效他国的成功行为,仿效或者模仿是积极学习或观念的扩散。

^③ Emanuel Adler, "Cognitive Evolution: A Dynamic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ir Progress (1991)," Reprinted in *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pistemic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65-88.

^④ 笔者在此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总体因果逻辑的简洁表述。

战争的伤亡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一) 地理因素

在大国之中,美国在地理位置上是得天独厚的。与其他大国不同,美国不必担心身边会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国或敌人的威胁。正如尤金·戈尔茨(Eugene Gholz)、达里尔·普雷斯(Daryl G. Press)和哈维·萨博斯基(Harvey M. Sapolsky)笑言“其北面 and 南面都是弱小的友好的邻国,而东面和西面则都是鱼。”^①

英国同样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天然的屏障保护它免受战争的蹂躏,也使得“光荣孤立”时代成为可能。尽管与美国相比英国的潜在敌人在地理位置上更为接近,但是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均有助于英国在历史上免遭来自欧洲大陆的重大攻击。海域屏障使得英国在欧陆的纷争中能够置身事外,从而能够将注意力集中于经营它的帝国。

与美国和英国不同,法国的地理位置没有任何令人称羨之处。法国在地理上没有任何强大的自然屏障可以依托。因此,在战时,战火经常会燃烧至法国境内,地理位置使得法国总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目标。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深感法国在地理位置上的脆弱,感慨道“没有山,没有沟壑,没有悬崖。这就是法国……一个猎物,这么近,这么诱人,这么容易。”^②

总之,从地理位置上看,美国在这三个国家中是最有利的,英国第二,法国最后。我们推定这三国的空间布局以及土地和海域的空间保护它们免受战争之苦的方式将会影响这些国家的民众对政府海外军事干预的感受。鉴于地理因素使得美国民众未能感受到冲突中血淋淋的一面,我们据此认为,美国民众要比英国、法国民众更倾向于支持政府的海外军事干预。

(二) 实力与技术的放大效应

如果说地理上与冲突的临近会严重影响到民众对武装冲突的认知,实力及其对战场的影响也同样重要。自20世纪以来,美国对其他所有大国都保持了综合实力的绝对优势(见表1)。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191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出了德国的2倍。况且,20世纪以来,如果按人均GDP计算的话,美国还对其

^① Eugene Gholz, Daryl G. Press, and Harvey M. Sapolsky, “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 8;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 28; Campbell Craig, “Review Article: American Realism versus American Imperi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57, No. 1, 2004, pp. 156 – 158.

^② Cyril Falls, “Geography and War Strateg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12, No. 1/3, 1948, pp. 4 – 15.

他所有大国保持了技术上的绝对领先优势。^① 如果用 GDP 总量与人均 GDP 的乘数计算 美国所拥有的强大实力优势足以令其将敌人击溃于战场而根本不必遭受其对手所遭受的伤亡。通过在海外作战 美国更进一步使美国大陆远离战争的残酷和直接恐怖。其结果是 美国人的战争经验更多的是在他国领土上所获得的凯旋和英雄主义, 而并非是看到家园的毁灭和居民逃离城市。因此 我们认为 美国人远不如英国和法国民众对战争的前景那么恐惧。

表1 美国与其对手实力对比(1914-2003)^②

战争	国内生产总值 (10亿美元, 1990年国际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1990年国际元)	伤亡数 (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美国	478	4 799	320 710
奥匈帝国	20	2 876	4 842 500
德国	202	3 059	6 815 689
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1945年)			
美国	1 099	8 206	1 085 119
德国	401	5 711	11 280 000
意大利	154	3 432	757 941
日本	213	2 873	3 563 878
朝鲜战争(1950-1953年)			
美国	1 456	9 561	147 131
中国	240	439	888 396
朝鲜	7.3	767.7	518 584
多米尼加战争(1965)			
美国	2 607	13 419	67
多米尼加共和国	5	1 259	1000

① 传统上 国际关系学界对军事技术和冲突的认知是被攻防理论(ODT)所主导的。但是 这一理论有严重的缺陷 详情参见 Tang Shiping, "Offense - defense Theory: Toward a Definitive Understanding,"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2, 2010, pp. 213 - 260.

② 经济指标参见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2003。数字是在美国战争干预开始前计算得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单位是10亿1990年吉尔里-哈米斯元(又称国际元) GDP单位是1990年吉尔里-哈米斯元。越南北方的伤亡数字是基于鲁道夫·拉梅尔(Rudolph J. Rummel)估算的平均值 参见 Rudolph J. Rummel, *Statistics of Democide: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http://www.hawaii.edu/powerkills/welcome.html>, Accessed March 2009, Münster: LIT, 1998。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伤亡数字是2001年和2003年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后的统计。

美国军事干预主义: 一个社会进化的诠释

续表 1

战争	国内生产总值 (10 亿美元, 1990 年国际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1990 年国际元)	伤亡数 (人)
越南战争(1965 - 1973 年)			
美国	2 607	13 419	212 926
越南北方	33	617	1 500 500
中国	505	706	1146
苏联	1 068	4 634	16
格林纳达战争(1983 年)			
美国	4 433	18 920	135
格林纳达	0.18 - 0.31	895 - 3 263	404
古巴	29	2 944	84
利比亚战争(1986 年)			
美国	5 110	21 236	3
利比亚	13	3 586	93
海湾战争(1991 年)			
美国	5 776	22 785	31
伊拉克	17	947	70 000
索马里战争(1992 - 1994 年)			
美国	5 952	23 169	92
索马里	6	908	3 500 - 4 500
波斯尼亚战争(1994 年)			
美国	6 357	24 130	18
波斯尼亚	7	2 021	97 207
海地战争(1994 年)			
美国	6 357	24 130	7
海地	5	753	3 000
阿富汗战争(2001 年 -)			
美国(2001 年)	7 966	27 948	333
阿富汗	12.2	453	5 000 - 10 000
伊拉克战争(2003 年 -)			
美国(2001 年)	7 966	27 948	2 923
伊拉克(2002 年)	32.3	5 138	>25 000

总之,无论以何种方式衡量,早在1945年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获得公认之前,美国就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了。美国在地理和综合实力上均优于英国、法国;英国虽然在地理环境上优于法国,但综合国力并无明显优势。因此,与英国相比,美国外交政策的精英和民众更愿意支持军事干预,而英国的精英和民众则要比法国更支持海外军事行动。显然,美国精英和公众舆论也要比法国更易于支持其政府的海外军事干预。

四 定性分析:战争记忆的影响

在这部分,我们将对本文的假说提供定性支持。我们要表明两点:第一,一个国家对战争的认知与历史上它在冲突中遭受的重创程度直接相关,而后者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第二,历史上战争的记忆会影响国家领导人以及公众对潜在武装冲突的态度。

(一) 地理、冲突的破坏力以及国家战争观

美国的地理位置使美国人免于遭受军事冲突的苦难。除了1812年的战争、日本突袭珍珠港以及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还没有哪支外国军队能够在美国本土制造杀戮。除了珍珠港事件,美国及其民众还未曾直接经历过恐怖的空中轰炸(珍珠港袭击发生在夏威夷,非美国本土)。环绕美国的大洋让美国人有了足够的安全感,这是其他大国的公民无福享受的。

不列颠诸岛的地理位置也让英国人对其“物理安全”有着相对的自信。尽管英国在二战期间曾经受到德国的空中轰炸,但不列颠诸岛在现代基本上未曾受到外国军队的打扰。有了皇家海军以及后来空军的巡逻,不列颠周围的海域在历史上成功地阻挡了外国的入侵。

不过,英国人对国家地理屏障对其安全的保护并不如美国人那样自信。举例来说,英国人承认,德国在二战期间本是可以穿过英吉利海峡对其发动入侵的。但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扼杀了德国的跨海峡作战计划,这些事件包括英国皇家海军在英吉利海峡的强大威慑力、德国空军未能获得对英国皇家空军的空中优势以及德国开始“巴巴罗萨”行动的决定。^①

^① Jacqueline Scott and Lilian Zac, "Collective Memories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57, No. 3, 1993, pp. 315-331; Robert Mackay, *Half the Battle: Civilian Morale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与美国和英国不同,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战火中屡遭涂炭。它没有强有力的天然屏障将冲突挡在边界之外,并且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外国入侵和毁灭性的暴力。

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均遭受重创。在一战期间,法国大约9%的建筑被夷为平地,750万亩的沃土在不停的轰炸中化为废墟,这种破坏是英国和美国所没有经历过的。二战时,法国25%的建筑被毁,超过一半的交通设施瘫痪。对比之下,二战中,英国130万的房屋中仅有0.15%被摧毁,29%被损坏。^①

战争的残酷给法国人带来了心理上的创伤,也推动了一战尤其是二战后法国民众中和平主义和反干预主义的兴起。^②而在美国人和英国人中,像二战这样的战争在民众中产生的情绪更矛盾一些。与法国相比,美国和英国所遭受的心理创伤要小得多。在美国和英国的民众之间,前者比后者经历的战争磨难更间接一些。在1985年和1990年有机构曾经分别对1410名美国人和600名英国人进行调查,以考察他们对世界大事(例如二战)的集体记忆。结果丝毫不奇怪,有362名美国人和251名英国人提到冲突是一个重要的全球事件,他们认为二战“给英国带来的负面记忆要远高于美国”。在英国人中,战争是与剥夺和创伤联系在一起的。一位40岁的男性提及“战争的恐怖”;一位56岁的女性还记得“炸弹落在家的附近、防空洞以及伤害”;还有一位62岁的男性认为,战争“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知道了战争究竟是什么样子,会发生什么,那是痛苦的记忆”。^③

而相反,大多数美国人常常把加入二战看成是一件高尚的举动,是推动民主、自由和自主的正义事业,如同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的畅销书《最伟大的一代》所描述的那样。^④他们总是将战争与爱国联系起来,而不是悲剧;他们还认为战争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而不会失去。在杰奎琳·斯科特(Jacqueline Scott)和莉莉安·扎克(Lilian Zac)看来,盎格鲁-撒克逊与美利坚之间的观念差异原因很简单,“战争的悲剧离英国更近,离美国更远”。^⑤

(三) 综合实力、技术——实力放大器、战争的印象

^① Anthony Ley, *A History of Building Control in England and Wales, 1840-1990*, London: RICS Books, 2000, p. 128; Thomas R. Christofferson and Michael S. Christofferson, *France during World War II: From Defeat to Liberati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99; André Corvisier, “Depradations,” in André Corvisier, ed., *A Dictionary of Military History and the Art of Wa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4, p. 191.

^② Ann-Louise Shapiro, “Fixing History: Narratives of World War I in Franc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6, No. 4, 1997, pp. 116-128.

^③ Jacqueline Scott and Lilian Zac, “Collective Memories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329.

^④ Tom Brokaw,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⑤ Jacqueline Scott and Lilian Zac, “Collective Memories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329.

除地理因素之外,美国超强的综合国力以及技术优势这个因素同样塑造了美国的战争观。它使美国人相信“干净的战争(antiseptic war)”——美国能够无重大伤亡地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并取得优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持续的。凭借超强的军事实力对敌作战,并经常保持着高于敌方的杀伤率,美国由此更加相信战争是可以做到相对“干净”的。

美国在综合国力和技术上的绝对优势能够使它横扫对手而不至于遭受较大的人员伤亡。柯蒂斯·李梅将军曾经大言不惭地表示“美国应该将(越南北方)炸回石器时代”。这句话明确传达出的逻辑是:美国的重火力可以在美军生命无伤亡的情况下推进美国的利益,而要付出的代价仅仅是炸弹,而不是生命。

这种可以打一场“干净的战争”的想法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对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美军飞行员而言,轰炸伊拉克就像是“你所看到的最大的独立日焰火表演”,而不是一次血淋淋的任务。^①由于美国媒体并不愿意向公众展示过多的屠杀场面,“战争因此是以一种超现实的视频游戏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导致模拟中东战争的视频游戏销量大增”。战争看起来既没有流血,又冷静客观。另一方的非战斗死亡过去和现在都被认为是“间接伤害”。这样的战争叙述或“言语行为”掩盖了战争的血腥和真相:战争看上去没有受害者,只有人性化的英雄和爱国者以及应得到报应的野蛮暴君。有了这样的战争叙事,战争的暴虐没有深刻于美国人的心中也就不奇怪了。

正相反,在本文国家谱系的另一端,很少法国人相信战争可以是干净的。历史上,法国人与军事和技术能力相当的手在法国本土作战,法国人对战争的残酷有着长期的体验。法国的综合国力无法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对法国一代人的屠戮,也无法向其人民保证,当代的武装冲突会是不流血的战事。这种认识也进一步抑制了法国在海外的军事冒险主义。即使是1990-1991年后勤补给不畅的法国军队被美国派至中东,执行它们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海外军事行动,法国政府仍然对卷入海湾冲突犹豫不决,并在国内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没有多少法国人认为这场针对据称100万伊拉克军队的战争会是场不流血的冲突。这种担忧也使得法国人对干预科威特持否定态度。^②二战结束以后,法国观念市场的主流仍然对海外军事冒险的想法抱有敌

^① Sandra E. Moriarty and David Shaw, “An Antiseptic War? A Study of Images from the Persian Gulf,” *Visu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No. 2, 1995, p. 4.

^② Maurice Vaisse, “A Certain Idea of Peace in France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Day,” *French History*, Vol. 18, No. 3, 2004, pp. 331-337.

意,法国的综合国力尚不足以消除人们对干净的战争的疑虑。

对英国来说,在军事技术总体上还不复杂、英国国力还相对占优的时期,集中资源优势的海军还能够为这个国家抵御外来入侵提供强大的防御力量,并且有足够的外交空间与欧洲的竞争对手们周旋。拥有装备精良的海军舰队,英吉利海峡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护城河。但是,与法国一样,当英国真的卷入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时,它的综合国力又不足以保护它的人民远离战壕的恐怖和不间断的轰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过后,仅仅是那些再也无法和家人团聚的、在街上步履艰难的残疾和伤兵的数字,足以让英国人刻骨铭心。英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惧来自德国飞行员和V-2火箭。因此,英国的实力最终还是没能让英国人民远离血腥的战争。尽管如此,英国的天然地理屏障(再加上幸运的因素)的确做到了一件事:避开了一次外国入侵。

(四) 战争记忆的短期和长期阴影

英国、法国和美国不同的战争经历以及对战争恐怖的感受决定了它们对战争的不同理解以及它们对待未来战争的态度。历史上战争的某些方面不仅被留在了社会对战争的集体记忆之中,而且这些记忆的确会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社会经验以及公众对武装冲突和军事干预的态度。简言之,一国民众对这个国家历史上(以及最近的)战争的记忆将影响他们是否会支持未来政府的海外军事干预。

我们区分“负面的战争历史记忆”与“从近期军事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尽管两者都基于“负面学习”。前者是一种普遍的教训(例如“战争是破坏性的”或者“战争是简单和光荣的”);后者正相反,它是指从某一次具体的战争中获得的教训(例如“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就可以赢得战争”或者“我们本应该避免这场战争”)。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说法,它是在获得负面经验或结果之后出现的一种典型的“反事实演练(counterfactual exercise)”。^①换言之,“负面的战争历史记忆”是一种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东西,而“从近期军事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则是浅层次的、暂时的。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当美国在海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军事溃败之后,通过负面学习(根据常识判断以及本文理论所强调的),美国不太容易会在短期内再次出兵海外。但是,由于美国具备的两个物质优势,一次军事失败仍然不能真正地让美国认识到战争的真实破坏力。

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对一场新冲突的定位很明显取决于他们在以往战争中的经历。

^① Kai Epstude and Neal J. Roese,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2, No. 2, 2008, pp. 168-192.

有了地理和综合国力这两大物质因素保护他们免受战争的蹂躏,大多数美国精英都会对海外军事干预持乐观的态度。历史上那么多次的军事胜利也进一步创造一个支持军事干预主义的观念市场。民调显示(参见表2)精英对美国海外干预的支持率始终很高。与此同时,失败的军事行动——虽然很少——不仅没有带来士气的彻底被摧毁,也没有让精英们产生对战争的厌恶。过去失败的军事行动——例如越南战争——带来的不幸却无法对精英的心态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因为精英们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过激烈战斗、未曾遭受现代武器装备所带来的巨大毁灭的环境里。

令人深思的是,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精英在军事干预问题上的核心话题并不是如何“铸剑为犁”将军事技术用于和平发展,而更多的是如何在未来把剑磨砺得更加锋利。“越南综合征”与其说是心理上对战争的普遍反感,不如说是害怕下一场战争的失败。美军“不再重演(never again)”的口号要表达的并不是避免战争,而是如何避免美军再次自缚手脚地进行战争。美国从越南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应该从一开始就投入压倒性的兵力,当使用军事力量来推进美国海外战略目的时,应当一开始就准备好“退路”。如果这些原则在未来的冲突中得以应用,美军就能够取得胜利。^①

上述观念与“负面的战争历史记忆”背道而驰,再加上美国随后取得的几场战争的胜利,逐渐打消了对美国将在海外冲突中再次遭遇一次重大挫折的担忧。詹姆斯·贝克(James A. Baker, III)曾经就越南战争后美国一次重大海外干预的影响表示:“(1989年的)巴拿马(行动)打破了美国人民在后越南战争时代对使用武力的思维定式,确立了民众情感上的肯定,使我们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这对13个月之后沙漠风暴行动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②同样,第一次海湾战争——这场被乔治·布什总统断言“将越南综合征永远赶走”的战争——结束之后,很明显美国政界又恢复了对在更大程度上使用武力的信心。^③

^① Harry G. Summers, Jr., *On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 Novato: Presidio Press, 1982; Patrick Hagopian,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Memory: Veteran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ing*,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9.

^② James Mann,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p. 180.

^③ 乔治·布什的言论参见 Maureen Dowd, “War Introduced Nation to a Tougher Bush,”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91。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曾经在1993年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反问科林·鲍威尔“如果不能用的话,我们要那支你常挂在嘴边的超级军队有什么用?”参见 Colin. L.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p. 576。

表2 二战后美国精英阶层及普通民众对海外军事干预的支持率与反对率^①

案例	精英阶层 支持率(%)	精英阶层 反对率(%)	普通民众 支持率(%)	普通民众 反对率(%)
朝鲜 (1950 年)	78.7	21.3	78	15
越南 (1965 年)	99.6	0.4	58	35
格林纳达 (1983 年)			53	33
巴拿马 (1989 年)			28	59
伊拉克 (1991 年)	61.8	38.2	71.5	25
索马里 (1992 年)			74	21
波斯尼亚 (1993 年, 空战)			60	34
海地 (1994 年)	89.9	10.1	54	41
波斯尼亚 (1995 年)	67.6	32.4	40	55
科索沃 (1999 年, 空袭)	51.6	48.4	46	44
阿富汗 (2001 年)	99.8	0.2	85	12
伊拉克 (2003 年)	70.5	29.5	70	27
平均值 (所有案例)	77.4	22.6	59.8	33.4
平均值 (精英阶层及普通民 众意见均已知的案例)	77.4	22.6	62.8	31.8

从表2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的两次军事干预行动,美国公众的支持度曾经有所减弱,但此后对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支持再度回升。事实上,《今日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伊始进行的一份民调显示,78%的美国人表示对军队“有极大的信心”。^②同样,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③在海湾战争刚结束时就曾经预测,美国精英今后会更愿意考虑动用武力,他的预测基本上都应验了。1993年,

① 表中所有的数字都是比例数字。因为缺少行动前精英或民众民意的数字,表中没有包括1965年的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和1982年的黎巴嫩海军维和。基于美国的数据,我们对精英支持与民众支持这两组数字进行了T检验。分析显示,这两组人群对战争态度的差异在95%的置信水平($p = 0.061$)时数据上并不显著($t_{(df=7)} = 2.227$)。这主要是因为样本的有限。因此说,精英和公众对战争态度的差异不会是一个随机的结果。

② Stephen Budiansky and Bruce B. Auster, “A Force Reborn,” *U. S. News & World Report*, Vol. 110, No. 10, 1991, pp. 30–32.

③ Richard Falk, “Recycling Interventioni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9, No. 2, 1992, pp. 129–134.

4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波斯尼亚的干预将会像第一次海湾战争那样取得胜利,只有43%的人认为会像越南战争那样收场。^①值得关注的是,有50%的人表示了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支持。^②

简言之,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在越南战争后并没有被吓退,它仍然蛰伏于美国的观念市场上。而反对战争作为一种对立的思想是不大可能在一个被地理和超强国力保护下免受现代冲突屠戮的社会中发展壮大的。其结果,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接连胜利强化了美国将使用武力作为治国方略工具的信心,而偶尔的失利则会成为吸取教训的案例,以便在下一场战争中做得更好,更轻易地取胜。有了在外交事务中使用武力这样的观念,可以想象,美国精英和公众对未来政府的海外军事干预很可能会继续支持下去。

表3 二战后英国精英阶层及普通民众对海外军事干预的支持率与反对率

案例	精英阶层	精英阶层	普通民众	普通民众
	支持率(%)	反对率(%)	支持率(%)	反对率(%)
朝鲜战争(1950年)			50	41
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	50	39	33	47
马岛战争(1982年)			65	25
海湾战争(1991年)	86.6	5.2	68.5	22.5
波斯尼亚(1993年)			64	27
波斯尼亚(1995年)			62	39
科索沃(1999年)			55	27
阿富汗(2001年)			74	20
伊拉克(2003年)	62.5	22.6	35	51
平均值(所有案例)	66.3	22.3	56.4	33.3
平均值(精英阶层及普通民众意见均已知的案例)	66.3	22.3	45.5	40.2

^① 盖洛普 5/6/1993, 参见 Richard Sobel, "The Polls—Trends: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Bosn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2, No. 2, 1998, p. 251.

^② Eric V. Larson and Bogdan Savych, *American Public Support for Military Operation from Mogadishu to Baghdad*,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5, p. 152.

表 4 二战后法国精英阶层及普通民众对海外军事干预的支持率与反对率

案例	精英阶层 支持率(%)	精英阶层 反对率(%)	普通民众 支持率(%)	普通民众 反对率(%)
越南(1947)			37	37
阿尔及利亚(1955)	52	36		
阿尔及利亚(1956)	87	12		48
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	58.6	29	20	67
海湾战争(1991)	90.6	7.6	46	45
科索沃(1999)			68	22
阿富汗(2001)			66	28
伊拉克(2003)			15.6	75.5
平均值(所有案例)	72	21.1	42.1	46.1
平均值(精英阶层及普通民 众意见均已知的案例)	74.6	18.3	33	56

而对那些曾经经历战争屠戮的国家来说,其民众反对对外军事干预的呼声就更强烈一些。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将很多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将信奉战争是浪漫而美好的人变成了怀疑论者。在法国,不同阶层的人士都表达了他们对一战以及各类战争的绝望和痛苦。^①经历了二战后的毁灭和艰难,让·莫内(Jean Monnet)转而寻求避免在欧洲列强之间爆发另一场灾难性战争的政策。因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阿尔及利亚危机到当代,“法国被和平了,并且希望成为一个和平使者”。^②

与法国一样,英国也未能不受欧洲战争的影响。对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③而言,二战期间,她在格兰瑟姆和牛津的生活是毫发未损并且是相对不受干扰的,张伯伦绥靖政策的破产和丘吉尔抵抗政策的顽强之间的对比主宰了她对那段

^① Norman Ingram,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acifism in France 1919 - 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② Maurice Vaisse, “A Certain Idea of Peace in France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Day,” *French History*, Vol. 18, No. 3, 2004, p. 335.

^③ Margaret 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5, pp. 31 - 38.

时期的回忆。而对不那么幸运的鲍勃·霍尔曼(Bob Holman)来说,他在孩童时期“经历了伦敦闪电战”,“目睹了死亡和我们家园的毁灭”,战争“意味着每天都是害怕和恐惧”。^① 2001年联军入侵阿富汗之后,霍尔曼认为他从二战中得到的教训意味着针对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反应应该是:避免战争,以和平方式与对手交锋。他确信“任何孩子都不应该处于轰炸之下——这不仅适用于阿富汗(儿童),同样适用于美国和英国的孩子们。”^②

总之,一国民众对该国历史上战争的记忆将影响他们是否会支持未来政府主导的海外军事干预。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综合国力,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历史战争经验很明显是不同的。美国的地理和综合实力有效地使美国远离战争的恐怖,美国的精英和民众因而要比法国人和英国人更可能支持政府的海外军事干预。

五 定量验证和结果

在这部分中,我们对本文的假说提供定量证据。具体数据表明,美国幸运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在综合实力和技術上的绝对优势(以GDP总量和人均GDP计算)是使美国免遭战争破坏的主要原因。定量分析的数据补充并强化了定性分析的结果。两者结合,它们构成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不是无懈可击的话——这两个物质变量对维持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不可能单纯用观念因素来解释。

(一) 假说和变量

本文的核心假说是,因为美国精英和民众较少负面的战争记忆,因此他们要比英国和法国的精英和民众更易于支持政府的军事干预。我们的中间假说是,保护美国免遭大规模战争灾难并因此减少了他们对战争的负面记忆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幸运的地理位置以及绝对领先的综合实力和技術优势。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免遭外国入侵,其综合国力和技術实力确保美国只需要在战争中支付炸弹和机器而不是生命,因此减少了美国的军事伤亡和平民伤亡。

为了更加明确个人在战争中可能的损失与他们的战争观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对一个案例内部控制假说进行了验证。该控制假说是精英要比一般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更

^① Bob Holman, “Rain of Terror,” *Third Way*, Vol. 25, No. 1, 2002, p. 7.

^② Bob Holman, “Rain of Terror,” p. 7.

加积极,因为精英要承担的冲突中作战的成本更小。简言之,在全志愿兵役制度下,精英及其子女不太可能去自愿服役,因此,精英在战争中遭受个人损失的可能性较小,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也会更加积极。这个案例内部的控制假说应得到我们考察的三个国家的数据支持。当然,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中,精英的影响力始终高于民众^①,而当精英们就开战达成一致时,民众通常会给予精英更大的决策空间。^②

有关解释变量,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地理优势或劣势是通过谷歌地球来计算该国与其距离最近的大国对手之间的英里数。如果该国与一个大国对手相邻,那么为了计算方便(取对数),它们的地理距离设定为1(如法国和德国)。简单说,一国距离潜在敌对大国的距离越远,这个国家的地理优势就越大。

我们还计算实力的两个子项。第一项是冲突爆发时一国的GDP总量;第二项是技术实力,由冲突发端时的人均GDP来表示(均为不变美元价)。回归中的自变量是这两项数字的对数之和,表示的是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耗费金钱和军事装备而不是生命和流血的能力。

我们采取了一种间接的办法来考察一个社会的集体战争记忆与人们对军事干预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取得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三国精英和民众对其政府可能的军事干预行动的态度。我们通过计算在地面军事部署和战争授权正式下达之前精英们在国会或议会中的投票记录来表示精英对战争的支持程度。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是指该国开展军事行动前的民意调查数字。

(二) 两大保护盾: 地理位置以及实力和技术优势

毫无疑问,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在大战中保持着较低的伤亡率——以伤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一战中,美国在交战国家中(除了日本,统计中的个别情况)的军事伤亡率是最低的,也没有平民伤亡;二战中,美国参加的战斗要高于一战,但在冲突中的伤亡率(仍是以伤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远低于其他国家。美国在二战中的平民伤亡也很小。

目前,没有有关这些战争中平民伤亡(包括死亡和受伤)总数的可靠数字,而只有平民死亡总数的数据。我们再次采取了一种间接的方法:我们用平民死亡人数的对数来表示战争对平民人口的影响,零死亡标记为1(方便取对数)。我们还构建了一个人为的变量来表示战争对平民人口的影响,这个变量也可以作为一国在战争中遭受破坏

^① Lawrence R. Jacobs and Benjamin I. Page, "Who Influences U.S. Foreign Policy?" pp. 107-123.

^② Adam J. Berinsky, "Assuming the Costs of War: Events, Elites, and American Public Support for Military Conflic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4, 2007, pp. 975-997.

总量的一个近似指标(参见表5和表6中的模型3)。这个变量是平民死亡总数与军事伤亡总数之比。我们认为,这个变量的数字越高,战争对所有平民的影响越大。这个变量与平民死亡总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变量是相关的,在一战的显著性水平 $p = 0.065$ 的时候相关系数是 $r = 0.498$;二战的显著性水平 $p = 0.016$ 时,相关系数 $r = 0.520$ 。这表明我们的判断是可靠的。

表5 第一次世界大战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自变量/因变量	军事伤亡总数 (百人,取对数)	平民死亡总数 (千人,取对数)	平民死亡总数与军事伤亡总数之比
常数项	0.212 (2.168)	5.340 (4.509)	2.786 (3.152)
地理距离 (英里,取对数)	-0.350 (0.115)	-0.800** (0.240)	-0.749* (0.168)
领土面积 (10 000 平方公里,取对数)	0.231 (0.181)	0.194 (0.376)	-0.057 (0.263)
国家实力指数(由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两个子项确定)	0.653*** (0.063)	-0.029 (0.396)	-0.377 (0.277)
输赢情况(虚拟变量)	-0.061 (0.788)	-0.232 (1.638)	0.018 (1.145)
“政体 IV(Polity IV)”评分	-0.293 (.072)	0.041 (0.130)	0.715* (.091)
冲突持续的月份数	0.238 (0.023)	0.002 (0.047)	-0.114 (0.033)
修正确定系数(Adjusted R ²)	0.729	0.478	0.367
样本总量(N)	15	15	15

注:所有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标准误附于圆括号内。*: $p < 0.1$; **: $p < 0.05$; ***: $p < 0.01$ 。

表 6 第二次世界大战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自变量/因变量	军事伤亡总数 (百人,取对数)	平民死亡总数 (千人,取对数)	平民死亡总数与军事伤亡总数之比
常数项	-3.357 (2.471)	-4.147 (3.569)	1.563 (1.099)
地理距离 (英里,取对数)	-0.290** (0.118)	-0.939*** (0.170)	-0.542* (0.052)
领土面积 (10 000 平方公里,取对数)	0.389** (0.194)	0.174 (0.280)	-0.261 (.086)
国家实力指数(由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两个子项确定)	0.426*** (0.186)	0.251 (0.269)	-0.224 (0.083)
输赢情况(虚拟变量)	-0.097 (0.796)	0.336 (0.090)	0.609** (0.354)
“政体 IV(Polity IV) ”评分	-0.176 (0.062)	-0.052 (1.149)	0.108 (0.028)
冲突持续的月份数	0.451*** (0.012)	0.491** (0.018)	-0.035 (0.005)
修正确定系数(Adjusted R ²)	0.749	0.641	0.437
样本总量(N)	21	21	21

注: 所有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标准误附于圆括号内。*: $p < 0.1$; **: $p < 0.05$; ***: $p < 0.01$ 。

我们还增加了可能有用的四个控制自变量: 国家领土大小(单位是万平方公里)的对数; ①“政体 IV(Polity IV) ”评分; ②一个虚拟变量,表明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最终是赢家还是输家(赢 = 1 输 = 0); 冲突持续的月份数(根据一战和二战网站数字计算)。

① Gary Goertz and Paul Diehl, *Territorial 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1992.

② 来源: Polity IV 项目数据库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为了评价是哪—个变量更主要地导致了某—因变量的变化,我们出具标准化后的系数。

从一战数据(参见表5)得出的结果显示,地理距离是所有模型中对减少伤亡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将其对军事伤亡总量进行回归时,它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p < 0.1$ 。然而,当我们将它与反映战争对平民影响的两个指标进行回归时,地理距离就成为保护平民免遭冲突的唯一—变量,得到的显著性水平分别是 $p < 0.05$ 和 $p < 0.1$ 。实力指标显示与军事伤亡正相关($p < 0.01$),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对该结果的分析见下文)。当将其对反映战争给平民造成影响的指标进行回归时,实力指标显示负相关,尽管显著性水平没有达到临界值 $p < 0.1$ 。

重要的是,表5中的模型2和模型3明确地显示出,地理距离是影响战争对—国破坏力大小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地理距离与表示战争破坏的两个因变量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 -0.880 和 -0.749 ,显著性水平分别达到 $p < 0.05$ 和 $p < 0.1$ 。

根据二战数据得出的结果与—战相似(参见表6)。在二战中,地理距离仍然是保护国家免遭战争破坏甚至军事伤亡的最重要的因素,显著性水平达到 $p < 0.05$ 。当将其对平民伤亡人数的对数进行回归时,地理因素的保护力就显得尤为强大,显著性水平达到 $p < 0.001$ 。

对二战的数据集来说,实力指标同样在回归分析中显示出与军事伤亡指标之间的正相关,显著性水平达到 $p < 0.001$ 。结合—战的—分析结果,实力指标似乎无法在两次大战中都降低军事伤亡。我们认为原因在于:(1)实力较强的国家通常会应其盟国的要求承担更大的战斗任务,因而会向战场派出更多的军队,从而造成更大的伤亡;(2)军事伤亡还受到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例如战场的战略部署和战术把握等。

尽管有关实力会降低美国军事伤亡的假说没有得到数据支持,我们认为原因还可能在于两次大战中美国与其他主要对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之间的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然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技术实力方面保持了巨大的优势。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实力因素在—战和二战中可能没有对美国军人发挥那么强大的保护作用,这个因素还是可能会在二战后发挥强大的保护力。

我们于是作散点图(参见图1)战争中的伤亡比值是因变量(美国对手的伤亡数字/美国的伤亡数字),实力差距比值是自变量 $[\log(\text{美国GDP总量}/\text{美国对手GDP总量}) + \log(\text{美国人均GDP}/\text{美国对手人均GDP})]$ 。我们预测,这两个指标应该是正相关,也就是说,较强的实力优势(再加上技术的放大效应)应该能够使该国减少伤亡,同时给对手造成较大的死伤。分析的结果显示,两项指标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好的正相关,相关系数是

0.553 ($R^2 = 0.306$) $p = 0.062$ (< 0.1) 尽管样本数较小(为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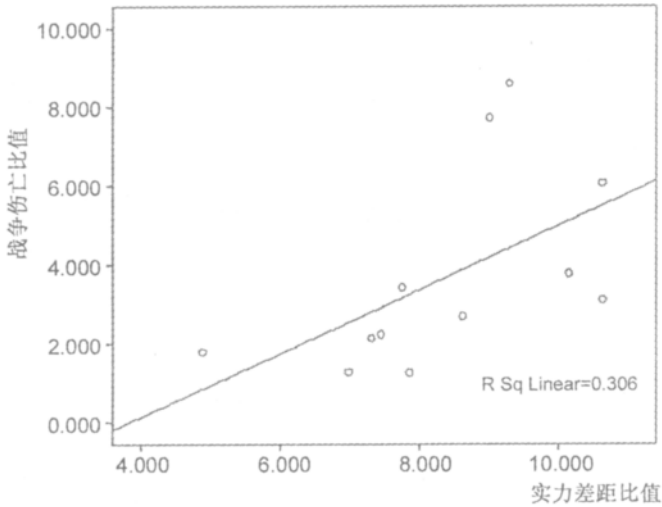


图 1 实力差距比值与战争伤亡比值关系散点图

注: 相关系数 $R = 0.553$ ($R^2 = 0.306$) , $p = 0.062$ (< 0.1) , $N = 12$ 。

总的来看,数据结果基本上支持了我们的假说。地理距离是保护一个国家在两次大战中免遭战争破坏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美国是大国中最具优势的国家。实力也是一项减少军事伤亡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后二战时期。在这方面,美国的表现也极为出色。因此,在能够保护一国远离战争恐怖的两个重要因素方面,美国毫无疑问是大国中最值得羡慕的。

(三) 精英与民意

案例内部的控制假说——精英要比普通民众更有可能支持对外军事干预——同样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在所有三个国家中,几乎在军事干预探讨的每个关口,精英都要比大众更可能支持对外敌使用武力,很少反对(参见表 7)。平均看,美国精英对海外军事干预的支持率要比民众高 15%,反对的比率低 10%;在英国,这两个比例分别是 20% 和 18%,法国分别是 40% 和 38% (仅考察了两个数字都有的案例)。尽管因为样本的有限和数据的不完整(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我们不应该夸大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数字差距的重要性,但仍然可以明确地看出,我们案例内部的控制假说是得到现有数据支持的。

表7 美国、英国、法国国内对海外军事干预的支持率与反对率

	精英阶层	精英阶层	普通民众	普通民众
	平均支持率	平均反对率	平均支持率	平均反对率
美国	77.4%	22.5%	59.8%	33.4%
	(18.2)	(18.2)	(22.4)	(20.6)
	N=8	N=8	N=12	N=12
英国	66.3%	22.3%	56.4%	33.3%
	(18.6)	(16.9)	(14.4)	(11.4)
	N=3	N=3	N=9	N=9
法国	72.1%	21.1%	42.1%	46.1%
	(19.6)	(13.5)	(22.2)	(19.5)
	N=4	N=4	N=6	N=7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精英和民众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都要比英国和法国更支持战争。这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在地理和绝对实力的保护下,美国会比英国或法国更愿意以武力为手段推进其海外目标。而在伦敦和巴黎,负面战争记忆对冲突的抑制力则要比华盛顿更强大。

(四) 小结

总之,定量分析的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说。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当决策者和公众在考虑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时,一个社会的集体战争记忆总是在幕后。我们的案例充分说明,一国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战争创伤决定了该国集体的战争记忆,它影响了该国精英和公众对未来潜在在军事干预的态度。

其他的研究也为我们的假说提供了支持。在一次试验场景中,戴维·鲁索(David L. Rousseau)^①发现,当一个国家拥有2:1的有利的军事优势时,认同这个国家的个人中有59%更愿意支持军事手段解决边界争端。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分布不利为1:2时,支持军事手段的人数比例降至24%(两次实验差异的统计显著水平为0.001)。由于美国通常要比对手享有更大的军事优势,美国人愿意支持战争的机会就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即使争端并不涉及领土主权问题。

我们得到的结果——精英总是比大众更支持军事干预——与使用基于场景的试

^① David L. Rousseau, *Identifying Threats and Threatening Identiti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sm and Liber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4-58.

验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后者通过向精英和民众提问以获得他们在假想情景下对可能军事行动的看法。^① 毫无例外,精英总是要比一般民众更支持军事行动。对奥利·霍尔蒂(Ole R. Holsti)编组的数据进行T检验发现,两组战争观的差异在置信水平99.9% ($p < 0.001$)的时候具有统计显著性($t_{(df=32)} = 7.914$)。

最后,我们发现,精英之所以会比大众更支持军事干预,主要是因为精英不太可能将他们的孩子送上战场,这与罗伯特·乌尔巴彻(Robert Urbatsch)^②通过一次巧妙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他发现,与有男孩子的家庭相比,只有女孩子的家庭因为不会面临将孩子送到危险地方的可能,因而更可能支持军事干预。

六 物质力量、观念、选择、国家行为

我们的研究有力表明,缺少深层次的负面战争记忆——由两个物质因素决定——使得美国精英和公众要比英国人和法国人更可能支持(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这些发现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以及对一般的社会理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统上,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力量的影响——尤其是地理和物质实力——而忽视观念因素对国家行为的作用。目前,现实主义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观念来解释国家行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也是权宜所需:当国家的表现不像现实主义设想的那样“现实”的时候,只好“偷偷”将观念纳入分析框架。建构主义正相反,它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作用,物质因素是次要的。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表明,物质世界与观念世界之间的互动以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这个难以被理论化的难题——是国际关系理论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③

前文的分析表明,通过社会进化理论将物质与观念力量纳入一个有机框架内是可能的。从社会进化论视角解读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我们认为,相比较其他大国,支持海外军事干预的观念更易于在美国的观念市场上占上风,原因在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技术实力所放大的综合国力优势。

我们的社会进化范式同时也将负面选择和积极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基于本文的

①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2001)," pp. 237-268.

② Robert Urbatsch, "Interdependent Preferences, Militarism, and Child Gen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3, No. 1, 2009, pp. 1-21.

③ Robert G. Herman, "Identity,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76.

分析框架,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行为取决于它在选民中所选择的、社会化的、内化的观念,但是选择和社会化的这整个过程是在人类大脑和某个特定的物质环境中发生的。因此,在某一观念和物质环境中无法良好运转的观念在将来就会消失或被消除,而那些在此背景下存活并发展起来的观念就将主导那个社会中民众的集体意识。在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技术实力所放大的综合国力优势的背景下,支持军事冒险主义的观念就要比那些支持谨慎的观念更易于“存活”,支持军事冒险主义的观念在美国精英和民众中间占据了稳固的地位(或更容易扩散开),与英国和法国相比更为顽固。

尽管国际体系中的大多数国家都被选择和社会化,转而在全局政治中采取了一种更加温和的立场,美国却始终是个例外。特定的物质条件使得美国免遭战争的巨大破坏,因而缺乏在国际政治中选择规避战争、防御立场的动机。那些在公开辩论中鼓吹海外军事行动的观点通常都会超过那些支持军事克制的声音。在有关“国家安全”的观念市场上,难以避免地会涉及美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①军事干预主义总是能取胜,而美国始终是当代大国中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

形成对比的是,二战结束后,军事冒险主义已经基本上在其他大国中消失了,包括英国、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大国(更不要说德国和日本了),都不具备承受一场军事失利或进退两难境地的战略纵深、实力资源和社会支持,它们因而会在进行军事冒险上更加保守。因此,与美国相比,1945年以后,这些大国的精英、更主要是民众始终更不愿意卷入一场遥远的军事干预行动。

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美国历史上所取得的实力优势对美国安全来说可能是有利的,但它们也让美国的行为更加好战。结果是,美国的福泽却成为那些遭受美国军事干预的国家和为了美国干预主义在战场上拼命的美国军人的诅咒。

我们相信,将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纳入一个分析框架来理解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其解释力要优于现有的研究,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尽管这两个学派均承认观念直接导致了国家的某项政策和行为,但它们都没有试图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相反,而我们揭示了物质基础——美国的地理位置和综合国力——才是构成美国国际行为的观念大厦的基石。我们并不否认观念因素在推动美国海外军事干预中的重要性,但我们要说明的是,缺少了物质基础,尤其是我们这里强调的两大重要物质因素,完全用观念因素来解释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是不完整和难以

^① Jane Cramer, "Militarized Patriotism: Why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Failed after 911," pp. 489-524.

令人信服的。

或许一个简单的反事实推理可以更进一步说服大家。假设美国处于欧陆的中心,也没有如今超强的实力,那么美国数代民众都不得不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冲突带来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美国精英和民众还会那么支持国家的海外军事冒险吗?最可能的答案将是“肯定不会”。

七 结论

地理给了美国一个令其他大国羡慕的安全环境。与其他大国不同,美国无须担忧周边邻国中会出现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的威胁。美国的地理位置毋庸置疑是美国人民之福。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美国所拥有的良好的安全环境很可能也会惠及他国。因为美国距离另一块大陆还比较遥远,海洋的阻隔使其很难寻求对其他地区的彻底占领。因而,即使美国渴求领土扩张,其他国家也不必太过畏惧。凭借其巨大的实力,美国就可以扮演一个终极“离岸平衡手”。美国的地理位置及其超强的实力也因此可以造福于国际社会。

然而,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里,美国的地理保护伞却常常成为其他国家的诅咒——最终对美国也是如此。海洋以及美国强大的实力和技术力量保护了美国精英和民众,使他们未曾见过战争的真面目。没有了负面战争记忆的抑制力,美国精英和民众在二战之后对军事干预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其他大国。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能够表现粗暴、强势推行其价值观,是因为地理和实力优势为它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虽然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然离不开信仰的支持,但是依靠自身的硬实力主动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必然会让那些不同信仰的国家感受到威胁。同时,美国精英和民众有着承天命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他们常常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国家害怕美国的超强实力,害怕美国推行其自以为普适的价值观。这种对其他国家担忧的冷漠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和(或)安全螺旋。

那么还能做些什么?要应对美国军事干预主义,理论上三种选择:(1)保持与美国的国际均势;(2)加强针对军事干预的国际立法限制;(3)增强美国的自我克制。但是,第一种选择不太现实。在单极秩序下,任何一个国家想要与美国的巨大实力保持均势,其代价之高无异于自我毁灭。任何想要制衡美国实力的反美同盟或联盟也将是不稳定和无意义的。因为担心被美国孤立报复,这种反美圈子的成员往往会倒戈或

保持中立。第二种做法同样有严重的局限。一项国际法律安排是要由所有大国同意,并规定它们只能在联合国授权之后才能使用武力,而这是不太可能落实的。

第三种选择同样有局限,但它是更有希望减缓美国的干预主义趋势的。要敦促美国自我约束,美国需要发展一个更加冷静的观念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反对军事冒险的观念能够有更大的胜出机会。由于篇幅限制无法深入细节,我们这里仅简要阐述一些建议。第一,既然美国不可能被入侵(我们也不希望美国本土出现一次可怕的战争),那么美国应该通过对战斗及其后果的仔细研究,更好地体会战争蹂躏的可怕以及战争对社会的影响。第二,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让他们相信,美国人是承天命来推行那些他们认为是“普适”的价值观(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理想)。美国人应该对此加以收敛,包括改革教育,加深对其他文化和社会价值的理解,因此具备更加国际的视野。第三,美国社会内部的部门(如军工产业)很可能会极力支持政府的海外军事干预,其业务应该接受认真和公开的详查,控制它们的影响。第四,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全球舆论,尤其是与美国想法对立的时候,并且做出回应。

还应该指出,对美国行为做出任何改变都需要时间。在地理环境和实力优势的保护下,美国人通常会选择支持而不是反对军事干预主义。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我们建议中提到的较为可行的建立美国自我约束的想法也不可能轻易地实现。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铸剑为犁。因为其地理和实力的优势,美国能够承担其攻击性行为的后果。由于缺乏负面战争记忆,精英和公众舆论往往会支持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在美国真正明白战争的真实面目之前,这是世界将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郎平译)

[收稿日期:2011-02-03]

[修回日期:2011-08-07]

[责任编辑:谭秀英]

tions , Tongji University.

America's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Tang Shiping and Joey S. R. Long (84)

【Abstract】 By synthesizing material forces with ideational forces more organically via a social evolutionary approach , we advanc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bout post – WWII 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We argue that post – WWII 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 that is , American elites' and public' s support for America' 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abroad –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 ideational or psychological forces alone. Rather , two crucial material variables , namely geography and aggregate power amplified by superior technological prowess , are indispensab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pens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intervene militarily abroad. These two factors have powerfully shielded American elites and public from the horrendous devastation of war. As a result ,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major states , American citizens and elite have tended to be less repelled by the prospect of war. The outcome is that since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far more active in military interventions overseas than other major states.

【Key Words】 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 , America' s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 material forces , ideas

【Authors】 Tang Shiping ,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SIRPA)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 China; Joey S. R. Long ,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Singapor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Li Shuyun (112)

【Abstract】 Sustainable Security is a new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ore hypothesis is that , if governments and NGOs can not control the consequences brought by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 we must aim to solve the root problems. Climate change , competition over resources , marginalization of the majority world (south – north divide) , and global militarization are all the driving forces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With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being moved from the scientific field to high politics ,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also upgrades from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o the ideas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 including the mutual building of various concepts of sustainable security